

空间的梦：流动人口的 “他乡”与“返乡”

——流动人口的一项调查研究

文 化 编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空间的梦：流动人口的 “他乡”与“返乡”

——流动人口的一项调查研究

文 化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的梦：流动人口的“他乡”与“返乡”：流动人口的一项调查

研究 / 文化编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5192 - 1

I. ①空… II. ①文… III. ①流动人口—研究—中国 IV. ①C92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70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特约编辑 胡新芳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 国 社 科 学 出 版 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城乡人口流动，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对当代出现的人口流动现象及产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涉及不同时期、不同的流动人群，不同的概念蕴含着不同的意义。李春玲在其研究中概述为：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最早的城乡流动人口被称之为“盲流”，随后“盲流”发展为“民工潮”，而现今则成为农民工现象。由“盲流”变为“民工潮”再发展到现今的农民工现象，反映出中国城乡移民运动的特殊历程。由于户口制度的持续影响，也由于城市政府的长期阻挠措施，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人一直是流动劳动力（农民工）而难以成为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通常是只身前往城市打工，把家人（配偶或子女）留在家乡，定期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打工积攒下来的钱不是在城市里购置房产而是在家乡建造大房子，因为他们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生育子女、养老和亡故）都安排在家乡而不是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把配偶和子女接入城市里与他们一起生活，但他们在农村的家乡仍保留着一个家（包括住房和责任田），而他们在城市里的家则常常像是一种临时性的居所。同时，即使他们在城市中已工作和居住了多年，他们还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人之间保持着长期的隔绝，农民工及其家人在城市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们被称之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这一称谓形象地描绘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的特征，他们处于流动当中，没有长期稳定的居所，无法明确他们的归属，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完成他们的移民过程，还没有成为在城市里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徘

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①这一解析是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抉择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我们看到，城市生存空间和农村生存空间是中国流动人口依存的两个互动关联的“流动空间”，它既是流动人口生存的物质空间，同时也是流动人口的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流动人口徘徊在城市与农村这样一个“流动空间”之间，经历了中国经济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与快速发展，他们不仅仅是转变生活空间的追梦者，更是造就现代化国家的践行者，大力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颇多。主要的理论与关注点是：运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关注农村怎么推出、城市怎么吸引等问题；运用社会文化理论，关注个人层面的生存条件怎么改善等问题；运用世界系统论，关注由于人口迁移问题涉及世界各国的很多问题，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落差等问题。在中国，以往流动人口的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研究、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化或分层状况、流动人口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流动人口的社区研究以及农民工外出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现代性的影响、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也有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职业特性、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城市融入和适应等微观层面和隐性角度的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研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社会网络和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心理等研究分析范式。^②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在“语言学转向”、“文化学转向”、“后现代转向”过程中出现“空间转向”的新视角。从学术渊源上看，关于社会空间的研究，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新都市社会学的发展。齐美尔在1903年提出空间社会学的观点，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列斐伏尔以“空间之生产”，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位一体的分析架构，成为系统阐释空间辩证逻辑的先导。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用“场所”这个概念代替了“空间”概念，经过吉登斯、布迪厄、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沙朗·佐京、彼得·桑德斯、詹姆逊等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发

^① 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展，形成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批判理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今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使对于社会空间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的重要方面。随之形成了以阿格尼丝·赫勒等人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学空间研究范式“主体—实践”研究范式。同时，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也把“全球化空间”、“世界城市”等概念推至前沿。

对于新型社会空间的社会学研究，在西方有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布迪厄的作为“场域”的空间、埃利亚斯的“宫廷化社会”、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环形建筑”、“监狱”等；在中国有费孝通的“乡土社会”、李培林的“城中村”、折晓叶的“超级村庄”、蓝宇蕴的“新村社共同体”、王颖的“新集体主义”社区、毛丹的“单位化村庄”、项飚的“新社会空间”等研究较为典型。对城市里的流动人口的空间研究有：李汉林提出的“虚拟社区”、周大鸣提出的“二元社区”、王春光、项飚、李汉林等学者提出的“浙江村”、项飚提出的“新社会空间”、李培林提出的“城中村”等言说。还有些学者就“弱者”空间实践策略的中国化应用进行了研究。潘泽泉基于广东的农民工寄寓空间，研究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探讨其利用自身种种社会文化资本来创造生存融入方式或多样的生活经验的策略及行为。^①陈映芳以制度变迁为语境，解释作为社会一方的行动者（市民/农民）是如何通过对制度的利用挖掘，来支持其捍卫家园的利益诉求的道德资源问题。^②童强在研究中，将城中村、居改非、街头摊贩等现象称为边缘空间或称缝隙空间的出现，认为快速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空间的重构致使大批城市新移民和市民化的农民的出现，这些人基于对制度和情境的反应而创造了各种生存的缝隙空间。^③等等。

学术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他乡”以及“返乡”的行动逻辑，可以说是一种“流动空间”之中的生存策略。体现着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实践、行动意义以及生存方式；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不仅仅是个人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做出的

^①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② 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种社会生活的抉择，而且也是流动人口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自觉生成过程；同样也是一种深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相互关联，制度、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运作逻辑影响的社会行为。

本书中我们以少数民族移民与多元文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经济融合、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社会网络建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闽西农村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的重构研究主题作为切入点，由5篇论文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论文有些是作者主持的项目研究成果；有些是作者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这些成果，看似独立成篇，却又相互关联成为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流动人口生存的“流动空间”的社会生活叙事。

第一，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社区的形成与多元文化的呈现，是由来已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向和相关联的问题。城市里的“新移民”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即少数民族“新移民”。更确切地讲，城市中形成的“因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学生聚落”中的少数民族以及“因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的少数民族，可谓“迁移至一个新城市中工作、居住、生活，并在本城市有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的趋势或意愿的特定群体”——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的聚落，是城市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城市多民族化的基础，也是城市多民族化的结果。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在进入一个城市后，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一个艰难的重建过程。它们生活在文化飞地，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与本土文化间的相融性，逐渐形成新生文化。这种文化飞地的少数民族的新生文化，由于其具有先赋性民族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形成了城市亚文化。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入。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的乡土社会网络和内在同质性，成为它们社会融入的优势条件。特别在进入城市的初期，以血缘、地缘、“教缘”为依托的社会网络作用非常重要。随着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居留时间的延长，通过增强自身的组织化、建立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加强和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进一步靠近主流社会的生活文化。它们自身具有先赋性民族文化，作为城市中的民族文化携带者，其进入城市不但是“就业与创

业移民”，而且是“文化移民”。将其从业与民族身份、民族习惯结合了起来。使西北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新移民”，不仅成为一个地域性群体，一个文化上相互认同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变成一个亲属关系网络的群体。

第二，以往关于少数民族融合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文化方面。这些研究认为，少数民族来自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当他们流动到城市，这些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与主流社会的区别会给他们带来融合上的困难。换言之，文化区别是影响融合的主要障碍。相对而言，我们的研究侧重探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的视角来理解融合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兰州市为代表的西北地域的城市中存在着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熟悉的民族文化环境，他们可充分利用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同质性，在民族特色经营行业实现创业或就业，民族文化一致性成为其从业的基本保证，从业与民族身份、民族习惯结合起来，形成了择业上的鲜明民族性与就业上的相对集中性。由于文化程度差别形成了“阶层分化”的现象。

第三，对延安市七里铺社区的流动人口社区社会网络建构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初级社会网络是目前流动人口在延安市七里铺社区中主要的社会网络类型，尤其是对于刚进城的流动人口来说，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几乎是其社会网络的全部构成。他们到延安市时社会网络建构的动机主要是出于“情感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流动人口进城初期，这两种动机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初级社会网络，随着在城市社区居住时间的增加和社会网络的扩张，他们建构初级社会网络更多的是出于“情感性动机”，而建构次级社会网络则更多的是出于“工具性动机。”从延安市七里铺社区流动人口的第一次的求职过程，我们发现，他们实现社会网络的建构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初级社会网络，二种是通过市场或中介机构，通过初级社会网络建构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他们的首要的选择，即通常所说的“找关系”，在不具备第一种建构社会网络条件的情况下，第二种途径则成为他们的选择，当流动人口在延安市的社会网络逐渐扩张后，社会网络的建构则更多的是通过他们在城市里已经建构的次级社会网络来实现的，目前，工作单位和社区在促进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方面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延安市七里铺社区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建构的规模，初级社会网络的规模相对于次级社会网络规模来说，社会网络的规模较大，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社会网络的规模

较大，流动人口在建构社会网络时均倾向于与同性别的人互动、交往，尤其是在次级社会网络的建构中，这种倾向显得更加突出。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与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关，男性对于社会网络的满意度比女性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对于自身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越高，文化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对于自身的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越低，也就是说，对于七里铺社区的流动人口来说，年龄与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呈正相关，文化程度与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呈负相关，月收入与社会网络规模的满意度则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月收入与社会网络规模呈正相关，但是本次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呈现任何的规律性。

第四，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西部传统社区走出来进城务工经商。研究中，我们将西部传统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南京市本地少数民族居民为参照群体，从族际通婚认知、意愿、期望、态度和评价四个方面对南京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观念”进行考察，呈现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一个纵向路线。研究表明，随着流动的进一步深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礼仪与习惯的依赖正在减少，居住上无法达到聚居状态，传统因素对成员的作用更加找不到着力点，个体的观念更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侵入”。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观念将逐渐发生变化，而趋向于现代。

第五，运用叙事性研究、访谈法和参与观察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事实研究方法，我们对闽西农村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重构现状开展了研究。研究表明，闽西农村返乡农民工在经历城市现代化、工业化洗礼之后无法适应原有的以家庭基础生产与核算的传统自卫组织，而将以利益化为导向的社会组织体系带入农村，推动原有的传统乡土情感关系断裂或者重构。这种新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形成使得乡村社会关系变得简单化、理性化，在乡村社会变革、重建过程中经济利益地位的凸显、现代“抽象体系”媒介作用的显著发挥，使得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作用降低以及传统社会支持网络依赖减少。可以说现代乡村社会关系的这一变革是符合市场经济需求，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结构，贴近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轨道。

本书中收录的成果，是在2005—2012年间相继完成撰写的，可以说

是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视角、内容和观点的缩影。由于多种因素，书中难免存在不少错讹疏漏之处。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引 言	(1)
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与多元文化	文化 宗力(1)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经济融合状况研究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	文化 温蓉 阿布都哈德 宗力 皮特·李 李晓玲(60)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构研究	
——以延安市七里铺社区流动人口为例	柳丽(98)
传统到现代:南京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观念研究	薛莉(152)
闽西农村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重构研究	蓝朝阳(221)

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 “新移民”与多元文化*

文化 宗力**

一 研究设计

(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出现的移民大潮，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这个移民潮包含三股移民流：一种是中国成为国际上最大的移民出口国、移出国；一种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各类城镇；还有一种是包括中小城市的居民在内，向大都市的流动。本文项目所涉及的移民是第二种——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各类城镇的一类：城市少数民族移民。

在中国，人口大迁移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就目前而言，“大迁移”这样一种事实乃至迁移的人群作为移民的身份，很少被认可。涉及大迁移的人群，不同的概念蕴含着不同的意义。目前人口学上以“迁移人口”概念专指新移民。这个概念认可迁移的事实，但其含义是完成了户口的迁移登录的人口。所以我们统计上的迁移人口，主要是已经在城市落实了户口的人口。而“移民”这个概念在中国现在一般被用以正

* 2005 年度第二批教育部“春晖计划”科研合作项目(西北民族大学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合作)。

** 文化，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宗力，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式被承认的移民，主要指“工程移民”、“水库移民”等开发性移民。而“流动人口”这一概念较为流行。其原本含义应指临时性的移动人口，但目前将所有迁移到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居住，甚至已经有明确的定居化倾向、却无法获得正式户口的人，都纳入到了“流动人口”这个概念中。在城市中，将他们作为“外来人口”来看待。同时，还将自农村流入城市的人群，称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可是因为户籍身份，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仍然被当作农民看待。甚至在城市中，有一些已经获得城市户口的人，如城市郊区征地农民，他们实际上已经获得这个城市的非农业的户口，但是他们被称为“农转非”，他们迁入城市居住后，跟城市居民的就业权利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未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城市里的“新移民”，无论是对象所指还是关注的问题，与上述几种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一方面它包含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新的居民，包括农民工在内。另一方面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区别于其他概念。关于移民问题，世界各国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颇多，如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也关注到移民问题。移民研究中主要关注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移民的起因问题，像经济学有推拉理论，就是农村怎么推出、城市怎么吸引等；社会文化理论，关注个人层面的生存条件怎么改善；世界系统论，由于移民问题涉及世界各国的很多问题，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落差。因而关注世界范围内南北之间通过移民到底是可以消除这样的落差，还是使既有的落差再产生、甚至扩大？这样的世界范围内的问题。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跟移民问题相关的一些社会公平问题。从结构上说，涉及制度层面到社会层面、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乃至个人层面的社会、文化的适应问题等。关于迁移成本，关于城市与新移民的关系、诸多综合因素、新移民进入一个城市后，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一个艰难的重建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有待于深入进行。

城市里的“新移民”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即少数民族“新移民”。更确切地讲，城市中形成的“因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学生聚落”中的少数民族以及“因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的少数民族，可谓“迁移至一个新城市中工作、居住、生活，并在本城市有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的趋势或意愿的特定群体”——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探讨他们的生活状况、对城市的认同、城市的融入与排斥等

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通过对居住于西北五省省会城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中的少数民族“新移民”的生活基本情况的考察研究，探讨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新移民”的生活基本情况、文化多样性传统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以及在目前如何构建“新移民”对城市的认同和适应的有效体制、如何在多种文化的平等共存的基础上，使城市民族关系朝着更为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使少数民族“新移民”对所居住城市产生责任感和归属感等内容。

研究的意义：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社区的形成与多元文化的呈现，是由来已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向和相关联的问题。本文将从城市与“新移民”的关系、“新移民”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重建及其文化结构的变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西北地区城市“新移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将会对西北地区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三）相关理论与文献成果

1. 相关理论

（1）社会融入与多元文化理论

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关于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入的理论探讨，可以分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诸多的研究认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探讨了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是如何融入于城市社会的相关问题。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社会资

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 1988 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波特斯提出，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此后，桑德斯与倪讨论了美国移民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他们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麦西等根据历史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的重要作用。

（3）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最初应用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诸多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首先受到制度维度上的社会排斥，主要是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在城市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流动人口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

2. 文献成果

依据李吉和发表的《近年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综述》文章内容，可以看到，近年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入城市动因的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点的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用的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社会支持与城市适应的研究以及少数民族流动问题的对策研究几个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系列良好的建议和对策。^①

重要的成果有：赵建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分层》，《改革》2004 年第 2 期；金春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中国民族》2002 年第 3 期；沈林、张继焦、杜宇等：《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

^① 李吉和：《近年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流动及其影响》,《满族研究》2001年第1期;拉毛才让:《试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构成、分布特点及动因》,《攀登》2005年第2期;周竞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华彦龙:《关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思考》,《中州统战》2003年第10期;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胡令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新情况、新问题》,《民族论坛》2001年第4期;马强:《回族特色人才的迁移就业及城市适应——广州市宁夏籍阿拉伯语从业者田野调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乐齐:《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迟丽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流迁问题研究》,《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杨军昌:《论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张继焦:《城市民族的多样化——以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影响为例》,《思想战线》2004年第3期;杨健吾:《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林均昌:《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对东部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凌锐:《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王琛、周大鸣:《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张继焦:《城市中的人口迁移与跨民族交往》,《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李伟梁、陈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伟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与适应》,《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陈云:《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李林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支持》,《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邓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林均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等保护”》,《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征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汤夺先:《城市少数民族论略》,《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等。

（四）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沈林根据城市少数民族的聚居程度采用了“城市少数民族聚落”的划分方法。他认为，所谓城市少数民族聚落就是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或居住点，他将东部城市的少数民族分为6种不同的聚落类型：城市世居少数民族聚落；因民族工作机关的设立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因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学生聚落；因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东部城市设立办事机构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因特色旅游景点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因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

依据上述划分，观察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的情况其特点，以“因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学生聚落”——民族高校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因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经济型少数民族人口为主体，作为城市中的民族文化携带者，其进入城市不但是“就业与创业移民”，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移民”。见于这种状况，我们在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中，设有民族院校的咸阳市、兰州市、银川市、西宁市当中，随机选取了兰州市、西宁市和银川市的民族高等院校作为调查地点。以甲校、乙校和丙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同时，在三个城市中，选取了银川市A市场、西宁市B市场、兰州市“C村”，三个“因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聚落”的少数民族移民作为研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问，收集数据资料与个案资料。对三个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新移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对城市的认同或归属感等认识方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相关的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以无结构式访谈方法进行深度访谈，收集详细的个案的资料。

二 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学生聚落

（一）研究缘起

民族院校是专门培养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综合性大学，目前分布在北